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10)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9.5
7
10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10)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武 曦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000

1990年5月 第1版 1990年5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7—80515—563—1/F·172

定价: 2.50元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

- 主任：**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教授
- 副主任：** 丁日初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 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 孔令仁 山东大学历史系 教授
- 丛翰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
- 张仲礼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研究员
- 陈诗启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
- 陈 绛 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
- 宓汝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 茅家琦 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 教授
- 洪霞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 研究员
- 徐元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 徐雪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 黄逸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编委会办公室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委会日常工作由丁日初副主任主持。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主任丁日初，副主任沈祖炜、程麟荪。

1984

目 录

- “孤岛”时期的民族棉纺工业……………王子建(1)
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实业……………沈其新(26)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清政权的历史地位及其
作用初探……………朱英(40)

问题讨论

- 关于东印度公司同散商关系问题及其他……………汪敬虞(54)

外论选译

- 现代中国与近代史研究——为理解中国社会而作
……………〔日〕滨下武志著 沈祖棻译(66)
论清末的对外贸易商品的流通机构——以行会的流
通垄断为中心——……………〔日〕宫田道昭著 丁日初译(76)
怎样阅读企业史资料汇编——编辑《启新洋灰公司史料》
所用资料卡片的查考
……………〔日〕久保亨著 毛来灵译(107)

学术交流与学术动态

- 巴黎访问追述……………丁日初(112)
中国近代史宏观研讨会综述……………陆兴龙(122)

关于苏中学术交流的通信……………〔苏〕麦利克谢托夫(128)

书评和新书介绍

评介麦利克谢托夫的专著《中国国民党的社会经济政策(1927—1949)》……………潘君祥(130)

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美〕白若伦著 陈 潮译 陈 绛校(143)

一个早期民族资本家走过的道路——喜读《经元善集》
……………徐元基(159)

日本《中国经济关系杂志记事总目录》简介……………黄汉民(168)

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书——《近代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
……………吟 羽(172)

介绍新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
……………殷 奎(175)

《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简介…邱力生(177)

《清代四川财政史料》出版……………川 社(181)

《聚兴诚银行》史料已出版……………邹以海(183)

学者传略

郑友揆传略……………程麟荪(184)

李文治写作传略……………江太新(192)

编辑与出版信息……………(75、106、121、158、180、182、191)

“孤岛”时期的民族棉纺工业

王 子 建

从 1890 年首创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始到新中国诞生将近 60 年的时间里，民族棉纺业经过坎坷的历程，取得缓慢的发展，其间出现过三次昙花一现的“黄金时期”，1938—1940 年的“孤岛繁荣”是其中的一次。

长期以来上海是全国棉纺工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它在“八·一三”战役中失去了 2/3 的工厂，部分遭炮火毁损，部分受损较轻微或完好的厂子则被日军强占。但是在“孤岛繁荣”的短时期内，民族棉纺业居然重获生机，并且积累了大量资金，为战后复兴准备了条件。此外，原来日本在沪棉纺企业的实力远远超过民族企业，然而双方角逐的结果，优势却在我方。本文拟对这一短期繁荣的背景、过程和影响作一些探索。

一、“孤岛”经济的背景及其演变

“孤岛”的存在始于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终于 1941 年“一二·八”珍珠港事变的爆发。在这 4 年零 4 个月时间里，整个经济经历了从战时萧条到复活、繁荣、逆转、衰退的过程，而民族棉纺工业是与此密切相联的。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袭击之后，同年 11 月中旬战事西移，上海的租界成了“孤岛”。其时的经济形势首先是外洋及内河的航运受阻，以致国内市场陷于停闭，对外贸易

也因之锐减。其次，金融业由于资金逃避而萎缩，市内商业趋于萧条。最严重的是工业凋零，战前全市 5200 余家工厂中有 2000 家以上被毁或受破坏^①，其余有条件维持生产的也都陷于半停顿状态。这种萧条景象直到 1938 年 2 月以后才有转机。

从 1938 年 3 月起，上海通往江、浙内地的交通线和通向东南、华南港口的航线先后恢复，国内贸易市场随之复苏，于是工商业由停滞转向活跃，批发物价指数不断上升。^② 伴随着工商业复苏而来的是金融业的活跃。战时逃避到外地的资金陆续调回，内地来沪栖息的富裕阶层挟带“窖藏”同来，广州、武汉沦陷后又有大批的人携带资金绕道香港来沪，银行存款大量增加；除此以外，还有巨额资金从内地大城市通过黑市换成外币来沪，或者直接存入外资银行。“孤岛”一时出现资金充溢的局面。^③ 银钱业资金的宽裕，对于工业复活起着重要作用。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1938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 日止，在租界内和沪西越界筑路区内新设工厂计 560 家；到 9 月底，租界内工厂数已达 2540 家；从 10 月到 1939 年 2 月，向电力公司申请接通电源的租界内新设工厂数每月以 300 到 500 家的数量增加，5 个月总数达 1994 家。^④ 依此估计，1940 年初全市工厂数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为民族棉纺工业的进展提供了直接的和间接的有利条件。

① 据上海市工厂检查所 1936 年统计，全市工厂数为 5218 家（《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年报》1939 年版，第 73 页），战时焚毁和遭破坏厂数仅公共租界内即有 1905 家（同上《年报》1938 年版，“概说”，第 25 页）。

②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8 页。

③ 汤心仪《上海之金融市场》。《战时上海经济》第 1 辑，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长风书店 1945 年版，14—15 页。

④ 汤心仪前引文，第 15 页。

在另一方面，由于侵华日军的破坏及国民政府控制外汇汇率的实力有限，措施失当，导致上海的外汇市场急剧动荡。在外汇动荡的同时，社会资金的壅塞有增无减，使战时一度稍减的各种投机活动，诸如证券、黄金、外币黑市和外商股票、纱、布买卖等先后死灰复燃。^①与此同时，人口从战前的350万扩大到了450万或500万，消费市场有了很大的扩张。这些就形成虚假畸形的“孤岛繁荣”的一部分。

从1939年6月以后，“孤岛”经济继续处在“景气”之中，直到1940年7月起才开始走向下坡。转折的关键，是由于日军破坏了上海到昆明运输干线中的滇越路联运段。随后，日军于7月开始出动海军舰只封锁越南海口，同时派兵驻守与我国边境毗邻的冲要地点。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上海商品在西南地区的广大市场，抑止了“孤岛”工商业、特别是棉纺业的发展。1940年秋季以后，外汇市场趋于稳定，中国政府在财政上得到美、英两国贷款支持，并且重新签订中美、中英两项外汇平准协定，金额扩大到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使外汇暂时得到控制。^②在这一阶段，资金壅塞现象有增无减，1940年初游资约5亿元，6月增至6亿元，当时棉纱囤户手里还冻结着3.75亿元资金。^③进入1941年后，商品内销市场几乎丧失殆尽，工商业全靠本地市场包括囤积户和投机活动来支撑。“孤岛”在它沉沦前夕实际上已面临经济危机的局面。

① 汤心仪前引文，第16—17页；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编《上海经济提要》，1941年版，135—137页。

② 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③ 《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40年，“贸易概论·导言”，41—42页。

二、民族棉纺织业恢复生机

民族棉纺工业在1936年冬季以前曾陷入危机长达5年之久，由于那一年秋季全国农产、特别是棉花丰收的刺激而开始好转。上海民族资本棉纺企业在危机时期搁浅停工的8家厂^①在1937年春通过改组、收买、租办、债权人(银团)接管经营等方式，全部恢复生产。这时全市31家民族资本棉纺厂的生产设备计纺机111.44万锭、织机8754台。^②这些厂不但全部开工，且计划扩大生产的至少有8家厂的10.77万纺锭。^③

经过淞沪战役，一部分厂陷入战区被侵略军占据后委托给日资纱厂经营，一部分厂座落在沪西租界内未受到战争影响继续生产，另一部分厂因各种原因在战役过后未能开工。具体情况如下：1.继续开工的工厂有申新二、申新九、新裕一、新裕二、永安三、统益、鸿章、大同、崇信、勤丰等10厂；2.日军占据的工厂有恒丰、振华、申新一、申新五、申新六、申新七、申新八、纬通、恒大、永安、永安二、永安四、大丰、鼎鑫、仁德、上海印染等16厂；3.厂址在战区，受创严重，未被占领也未开工的工厂有振泰、宝兴、民生等3厂；4.工厂在战区外，未被占领也未开工的有天生厂；5.厂在战区未被占领，由日本资本家从原业主手中收买过去改营它业的有美丰厂。^④以

① 8家厂名是：恒丰、振华、申新二、申新五、同昌、协丰、民生、经纬，见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第57页。

② 同上，第61页。

③ 8家厂名是：申新九、永安一、永安二、永安四、统益、大同、新裕一、勤丰，见《第十六次全国纱厂一览表》，1937年版。

④ 据多谷泰三《事变后的中国纺织业》补正，见大日本纺织联合会编《东亚共荣圈与纤维产业》，日本东京文理书院1941年版，第201、203、207、208页。

上 31 家纱厂战前设备和生产量见表1。

表1 1938 年 3 月民族棉纺工厂开工状况和战前生产概况

开工状况	厂数	纺锭	织机	年产纱	年产布
继续开工	10	374344	1700	181636件	641千匹
日军占据	16	676616	6081	324915	2789
受损严重未开工	3	46740	968	35448	375
未占领未开工	1	11588	—	—	—
日资收买	1	5120	5	—	—
战前总计	31	1114408	8754	541999	3805

资料来源：战前设备和产量数据华商纱厂联合会1937年3月调查，见《中国棉纺统计史料》，第61页。

战时公共租界西部驻有美国军队防守，在那里的 9 家中国纱厂^①和在法租界的勤丰纱厂得以继续生产。但那里也并非绝对安全，例如设在苏州河以南的永安三厂就遭到日机轰炸，有 10 余名工人同时罹难。^② 再加以战时交通受阻，营业不振，如申新二厂与九厂、新裕、永安三厂、鸿章等 5 厂都只开日班。^③ 因此棉纱市价出现下降趋向。战争爆发的 8 月份，20 支纱平均价为每件 285 元，以此为基期演算的指数显示：9、10 两月分别下降为 98.8 和 96.5；11 月战争停止，上升到 103.9；12 月又退到 100，同 8 月相当；1938 年 1、2 两月又连续下降，分别为 91.2 和 92.6，即每件纱价跌到 264 元。^④

形势好转在 1 月已见端倪。当时，申新总公司给滞留在香

① 其中包括厂址在苏州河北战区内的崇信纱厂，这家民族资本企业于 1927 年起委托印度庚兴洋行管理，因庚兴洋行受英国法律保护，故崇信虽设在租界以外，也得继续开工。

② 《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289 页。

③ 《申报》1937 年 9 月 25 日。

④ 20 支金城纱月平均价，据《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26—127 页。

港的总经理荣宗敬通信报告开工情况说：“我九厂为调剂应解客货起见，拟即重行恢复夜班，申二暂仍单班；苟环境需要，当亦立即予以恢复原状也”。^①一个月后，即在2月中旬，申新九厂和二厂就都“日夜班开足”^②。从3月起，民族棉纺工业开始复活、振兴了。3月份，纱价每件295元，超出战争发生那个月的3.5%，从此逐月上涨，到9月高达442元，指数比基期上升55%，形成了“孤岛”时期纱价上升的第一个高潮。

被封锁了几个月的上海与江浙各地之间的交通最先得到开放，“内地帮”纱商首先为“孤岛”棉纱市场带来活跃条件。接着是东南沿海到华南各口岸次第沟通，广州帮、汕头帮等纱商纷纷到来，大量采购。申新总公司4月底致香港办事处函称：“申地棉纱因广州、汕头等大量动办，市况更趋硬朗，全日统市成交二千余件（汕头帮所进者占半数），市价上涨四、五元。”^③随着从上海出海取道越南海防港，然后通过滇越铁路直达昆明的国际海陆联运通道的开辟，一个广阔的西南市场适时崛起。云南帮纱商对上海棉纱的需要量，从来就排在各客帮的前列名次之中。据海关统计资料，1936年从上海运往全国各口岸的棉纱总量为96万公担，折合约50万余件，其中蒙自关运进9.74万公担，折合5.1万件，占总量的10%强，次于重庆、天津、广州，居第四位。^④

另外，长江封锁之后，重庆港失去作用，原来重庆市场供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② 1938年2月24日申新总公司致香港办事处函。见注①。

③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9页。

④ 郑友揆、韩启桐《中国埠际贸易统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468—479页。（笔者按：该书原始统计资料系由海关统计部门提供）

应的棉纱，转求于昆明市场。在此情形下，昆明市场的需求量大幅度膨胀，云南帮对“孤岛”国产棉纱的需求随着剧增。同时贸易商结构也有所改变，除传统成帮的批发商外，还有一些实力雄厚的贸易机构参与贩运；有政府机构如农本局，金融系统的专业企业如中国银行投资经营的中国棉业公司，民间金融业投资的贸易企业如金城银行经营的通成公司，以及其它商业银行所属的贸易机构。其中，农本局是以收购棉花、纱、布为手段，负有平抑西南后方（主要是重庆）纱、布价格使命的国营事业。拥有如此雄厚的资力并以各种特殊背景为后盾的运销体系，对“孤岛”的棉纱市场和棉纺企业资本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刺激。

形势推动着开工中的 10 家工厂尽量扩张生产力。当时这 10 家厂已有的生产设备计纱锭 374344 枚、织机 1700 台；其中 5 家厂在复苏后已订出的扩充计划计有纺锭 71736 枚和织机 25⁰ 台。^①在形势好转初期，要求立即装置新设备是不可能的，于是各厂充分利用原有设备，采取开足班数并延长每班操作时间的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增产的目的，例如申新九厂、申新二厂、永安三厂等都采用这种办法。1938 年，各厂产量均大幅度增长。以申新和永安为例：申新二厂和九厂纱产量都比 1937 年增长 27%，申九布产量增长 52%；永安三厂纱产量比 1936 年增长 77%，布产量增长 60%^②。

棉纱市场的恢复和“孤岛”经济的全面活跃，使那些在战争中工厂被毁或被占据的业主中，一些人企图重振旧业，特别是在战火中曾抢出机器设备运储在租界内的那些人。1938 年 3 月，

① 《第十六次全国纱厂一览表》。

② 参见：《荣家企业史料》下，第 72、73 页；《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 272 页。

创议筹设新厂并着手兴建的就有6家，年内即有3家建成投产，设备有纱锭5万枚。1939年，又有6家落成开工，增加设备6.5万锭。到1941年共建厂11家，建厂时原始设备共纱锭14万枚。新企业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在战前原企业基础上经过改组重建的，主要投资人为原企业主。这些企业的机器设备和物资、厂产，或者全部转移给新企业，或者以部分投入新企业。由青岛华新纱厂蜕变而来的信和纱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青岛华新纱厂是以周志俊为代表的周氏家族投资的，企业性质是股份有限公司。七·七事变后周志俊将青岛华新机器设备的半数以上抢运到上海，准备转运重庆与华西实业公司合作举办新厂，因沪战骤起，江运阻塞，无法西运，遂利用这批设备在上海建厂，于1938年10月开工。信和在表面上同英商信昌洋行合作投资，实际上借此在香港注册，托庇于英政府保护，以应付日本军事当局。^①

中纺公司是一个组织机构比较复杂多变的企业。它的前身包括振泰纱厂、宝兴纱厂和达丰染织厂3个企业。其主要投资人是从事买办活动和经营进口洋布业的商人王启宇、余葆三、李柏葆等。^②3个厂都设在租界以外，沪战爆发，振泰和达丰先将物资运入租界，正待抢运机器时因战火迫近而束手，宝兴厂被焚毁，残余物资和主要机器几乎全部抢出运进租界内存储。振泰和达丰两厂毗邻，都被日军占据。该集团中人早就筹划在租界内建厂，并未因振泰、达丰被占而中辍，仍积极进行，经

① 公私合营青岛华新纺织厂编《青岛华新四十年》(初稿、油印本)1959年印，51—54页。

② 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公司业务研究委员会采访记录；严中平：《中国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7、365页。

3 厂投资人统筹安排，并联合英商信昌洋行行东高默塑（英国籍）组成中纺集团，创设两个企业：第一中纺公司（China Spinners Ltd.）和第二中纺公司（China Textile Mfg. Co. Ltd.），都在香港注册。第一中纺在租界西区租地建厂，安装由宝兴运出的纺、织机器和达丰的印染设备，于 1938 年 10 月先行开工。第二中纺准备在振泰原址整理恢复，由于厂房在日军占据中，于是凭借英商名义委托英人出面同日方交涉，经一年多时间的谈判，在 1939 年 3 月日方才同意交还，5 月由中纺接收开工。至此，第一、第二两个公司的名称已无必要，于是企业改称英商中纺公司（China Mills Ltd.），成为纺、织、印染齐备的综合企业，分设两个制造厂。新企业与信昌洋行解除了假设的合资协议。高默塑和另外两名英国人出面组织一家华信公司（China Agencies Ltd.）同中纺公司订约担任经理人，如此安排，无非是为了仍然保持一种应付日本人的手段罢了。^①企业经营权由王启宇总揽，他原是振泰、宝兴、达丰 3 厂创办人之一，历任 3 个企业的董事长或经理。

昌兴纺织印染公司是无锡丽新纺织印染公司在上海发展改建的新企业。最初，丽新负责人利用战前订购到沪的 250 台进口织机与无锡丽华染织厂共同出资成立了昌兴织布厂；随后另建了一所印染厂；最后才建造了拥有 11400 枚锭子的纺纱厂，于 1940 年建成投产。^②

第二种类型是被日军占据的外地企业运用原有资金在上海另立新厂，共有 4 家。它们的机器设备有的是战前在国外定购

① 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公司业务研究委员会编《达丰集团史料》（油印本），17—19页。

② 同上系列资料《丽新集团史料》。

的，如安达的纺机是常州大成纱厂昔日所订购^①，有的是战争进行中或停止后从外地拆卸装运到上海的，如保丰的机器来自无锡广丰纱厂^②，肇新的机器来自无锡广勤纱厂。此外，合丰是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面粉厂股东、职工投资，利用申新四厂让售的纺机（战前国外定货）建成的^③。

第三种是金融业投资经营的新企业，有德丰纱厂，其机器原属于民生纱厂，战前作为贷款抵押于中南银行。民生厂毁于战火，机器事先运入租界，中南银行据以建成新厂。^④

最后一种是战时集资新办的企业，共3家：荣丰、新生和公永。荣丰发起人是上海纺织印染公司主要投资人章荣初，他在“八·一三”前夕买进15000枚纱锭的纺机设备，于1938年创议集资筹设荣丰纱厂，同年6月组成，10月开工生产。^⑤新生纱厂组织者李迪先曾任申新六厂厂长，其它投资人也同纺织行业有业务关系；该厂纺机14000锭是从英商怡和洋行买进的旧机器。^⑥公永纱厂系当时棉纺业、银行业和纺织机械制造业中3个实力人物合资经营，14256锭纺机就是合伙人之一大隆机器厂负责人提供的。^⑦

新建厂的原始规模相对于战前各厂来说是偏小的，设备纱锭最多的信和厂不过26000枚，最小的合丰厂仅有4608枚。可是在1939—1940年“孤岛”期间，各新建厂也同旧企业一样无不盈利丰厚，为这些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1938

① 前引《安达集团史料》，35—36页。

② 据庆丰纱厂当时押运撤退物资的职员回忆。

③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47页。

④ 前引多谷泰三文，见《东亚共荣圈与纤维产业》，第210页。

⑤ 《荣丰八年史》，载于荣丰纺织厂编《雄风》第1卷第1期，上海，1946年。

⑥ 前引多谷泰三文，见《东亚共荣圈与纤维产业》，208、210页。

⑦ 《安达集团史料》，35—36页。

年和1939年建成的新厂在短短两三年中极大多数都增加了纺锭，有的厂并且增添了织布设备。截至1941年，11家新建厂纱锭达22.8万枚，织机达2700余台，同建厂时的设备相比，纱锭增加62%，织机增加72.9%，详见表2。

与此同时，战时幸存的10家工厂中也有增加设备扩大再生产的，4年中纱锭扩充到45.9万枚，增长22.7%；织机扩充到2609台，增长53.5%。这样，到“孤岛”时期的最后一年，民族资本棉纺工业已拥有21家厂，纱锭68.7万枚，织机5328台，如将捻线机当作纺锭折算，则全部设备生产能力共83.6万枚^①；此项总生产能力同1937年战时水平比较，增长95%，恢复到1937年战前全行业生产能力的61.3%，纺机和织机的恢复率分别为61.7%和60.9%（见表3）。

扩大生产能力是国内棉纱市场需求量增加的自然反应。继1938年市场繁荣之后，1939年进入发展的阶段，主要是由于战时大后方市场吸纳沪产棉纱量的增长。大后方纺织品市场在抗战期间基本上国产品独占。其时日厂产品遭到抵制，英资工厂生产的棉纱虽然能进入市场，但其产量相对有限，1938年为国产纱的21%，1939年只及国产纱的16.5%。^②还有一个同大后方市场比重相仿的本地市场，它在“繁荣”以后仍然稳定地存在着，这对中国棉纺业的继续前进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孤岛”时期染织业生产能力超过战前近90%。^③1939年本地纺织厂棉纱

① 每台织机相当于25只纺锭，每4枚捻线锭相当于1只纺锭；1941年捻线锭总数为65302枚。

② 英资厂商品纱产量：1938年4.76万件，1939年6.11万件，均系根据设备纺锭参照当年日资厂单位产量估算。纺锭设备：1938年23.3万锭，据《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年报》1938年版，报告及统计，第46页；1939年22.1万锭，据同上《年报》1939年版，第80页。

③ 上海染织厂及单纯织厂1936年设备织机12000台（据《战时上海经济》第1辑，198页），1939年22582台（据《上海经济提要》，101页）。